



〔美国〕马克斯韦耳·泰勒上将著

剑 与 犁

—— 泰 勒 回 忆 录

SWORDS and
PLOWSHARES

General
Maxwell D.
Taylor

商 务 印 书 馆

剑 与 犁

——泰勒回忆录——

〔美国〕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 著

伍文雄 朱曼罗 奚博铨 译

华幼中 王中一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Maxwell D. Taylor

General, U.S. Army (Retired)

SWORDS AND PLOWSHARES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2

本书根据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72年初版本翻译

剑与犁

麦克斯威尔·泰勒

〔美国〕**麦克斯威尔·泰勒** 将 著

伍立雄 朱**罗** 桑**德** 译

华幼中 王中**校**

商务印书馆 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07

1981年12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367千

印数12,900册

印张17 7/8

定价：1.85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马克斯韦尔·泰勒是美国陆军上将。他在二十年代初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以少尉军衔开始他的戎马生涯，到六十年代提升为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美国第一〇一空降师师长；五十年代初，美国侵朝战争期间，他是侵朝美军第八军军长；六十年代美国侵越战争期间，他亲自制订不少军事行动计划，并担任过美驻南越傀儡政权的大使；此外，他还曾历任驻柏林美军司令官、美国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重要职务。

本书作为他的回忆录，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他本人五十年从事军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包括他亲自参与的一些世界性重大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西里战役、同盟国接受意大利的投降、西欧盟军向希特勒德国发动总攻时在诺曼底的登陆作战、六十年代的猪湾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等等。他作为美国军事当局的最高决策人之一，曾协助美国总统作出美国的军事战略以及冷战计划。他在书中还记述了美国政府各部之间的矛盾、美国内部的弱点、美苏冷战和争霸的内幕。这对于我国读者了解美国的内外政策、军事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六十年代末的国际关系以及美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史料。但是泰勒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必然要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掩饰

事物的真相的，这是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分析和辨别的。

本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伍文雄、朱曼罗、奚博铨三同志承担，马炳忠同志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全书由华幼中、王中一二同志校订。

1981 年 8 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一个陆军少尉的培育	5
第二章 为担任高级指挥官作准备	17
第三章 西西里战役	39
第四章 在意大利执行任务	55
第五章 诺曼底总攻开始之日	74
第六章 阿纳姆战斗	94
第七章 从“突出部”到贝希特斯加登	110
第八章 出任西点军校校长	130
第九章 出任驻柏林美军司令官	145
第十章 随第八军在朝鲜	156
第十一章 朝鲜停战以后	179
第十二章 任陆军参谋长	200
第十三章 猪湾事件	219
第十四章 古巴报告	227
第十五章 任总统的军事代表	242
第十六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	254
第十七章 东南亚：1961 年	272
第十八章 赴西贡的使命	287
第十九章 重披戎装	311

第二十章	古巴——秘密危机阶段·····	335
第二十一章	对古巴的隔离·····	350
第二十二章	有限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	366
第二十三章	灾难的秋季·····	375
第二十四章	任约翰逊总统的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	399
第二十五章	西贡的变幻风云·····	414
第二十六章	败局已定·····	434
第二十七章	新战略·····	448
第二十八章	结束使命·····	460
第二十九章	总统顾问·····	474
第三十章	越南的当务之急：1966 年·····	487
第三十一章	越南：1967 年·····	496
第三十二章	关键性的一年：1968 年·····	506
第三十三章	即将卸任的顾问·····	522
第三十四章	越南的教训·····	529
第三十五章	调整日益衰落的力量·····	543

前 言

“他〔耶和華〕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聖經·舊約》：

《以賽亞書》第二章第四句

《彌迦書》第四章第三句

“要將犁頭打成刀劍，將鐮刀打成戈矛，軟弱的要說：我有勇力。”

——《聖經·舊約》：

《約珥書》第三章第十句

我在將近兩年間彎着患關節炎的脊背伏案寫作本書時，常常思忖自己為何要從事這一工作。我寫這部書的本意是，概括地總結我多年來對一個民主大國可以隨意支配的力量範圍和限度所作的各項結論。自傳部分按原計劃，僅限於讓讀者了解作者的經歷以及身份所需要的那些情況。但不料很快我就發覺重溫一些往事，並從容不迫地仔細琢磨其中深長的意味，是頗為有趣的，而且這種樂趣在事件發生的當時是難以領略到的。結果，緬懷個人往事的部分遠遠超過了我原來的打算。這種興之所至，卻給我造成很好的機會，得以讓我用個

人的经历来印证军人生涯中多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得以让我答谢陆军以及四十多年来同我在各政府部门一齐工作过的、勤勤恳恳的男女同事们对我的情谊。在我刚当少尉军官时，我那位曾经在南北战争期间支持过南部邦联的外祖父常常问我：“在不操练的时候，你们陆军里的伙伴们干些什么？”我希望本书对这个提得中肯的问题能给予一个陆军军人的回答。

我并不要求本书成为一部既有注释、又有印证参考的完备无缺的史书，它只是叙述我个人参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经历，记录我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印象，不求与他人的说法苟同。我很清楚，我在本书涉及的许多问题，都存在着非常值得尊重的同我的看法相反的意见。然而，我并不打算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加以反驳，我只是陈述自己的看法以及持这些看法的理由。我谨希望我的叙述同其他观察家的叙述一样，同时受到考虑，对史家将来编写这一段时期完整的历史时有所补益。

作为一个军人，在我戎马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关心的必然是如何使用军事力量来作为确保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增进国家利益的手段。虽然关心的方面如此集中，可能使人觉得有关世界问题的看法是从狭隘的专业角度出发的，但我却认为未必一定如此。在认真考虑如何使用军事力量时，必然会涉及一些基本问题，如国家利益的含义和反映国家利益的目标是否正确，等等。军人的职业使人有义务深入思考国家安全的要求：我们需要保护什么，怎样加以保护，为什么要加以保护。军人的职业也使人不能不研究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国家安全的要求同国内福利的要求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我准备在以后的章节中加以讨论的问题。

耐心的读者将会发现，我对我们作为世界大国的前景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鼓舞。虽然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轴心国进行总体战争时显示了惊人的力量，但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在对付威胁性较小的但形式不断变化的冷战，却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对于这方面的种种威胁，我们庞大的军火库里的武器只能作出有限的回答。我们的共产党对手使用所谓民族解放战争的技巧正是为了避免冒公开战争的风险，改用颠覆和利用内部弱点作为一种间接的征服手段。今天，我们就成为这种攻击的目标。当前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恢复在越南战争中丧失的团结，能否改善我们在使用自己拥有的力量时所表现出来的缺点。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比较迅速地调整我们的许多做法。

我担心，我就这个问题所写的许多内容会使人认为，美国今天已经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其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已成过去。其实，我是一个实践上的乐观主义者，我早就认识到悲观情绪恰恰有利于敌人，从而会促成自己的失败。本书谈到有可能出现的那些可怕的前景，但我并不认为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我们正面临着听任我们的民主制度因自己的暴行而自招毁灭的严重风险。防止灾难的一个办法是要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的新局面，特别是那些威胁，即明里暗里破坏我国力量的源泉——我们的团结、领导、制度和经济——的威胁。我国力量的这些源泉今天全都受到了攻击，即使没有敌人的枪炮，也有可能遭到摧毁。

我选择《剑与犁》作为本书书名。在选定书名前，我曾反复考虑过这篇前言一开头引用的《圣经》的先知预言中明显矛

盾之处。然而，只要细读一下《圣经》的这些引语上下文，就会发觉，先知的话是在“最后审判”时考虑到不同的时间和环境而说的，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其实不然。看来，它们之所以一致，在于最后审判日是需要用剑来除邪驱恶的；此后，在随之而来的美好世界里，剑就不再有用，那将是犁和镰的时代。

尽管书名的来历如此，本书并不想以预言的书自居。就本书而言，剑与犁只不过是一种象征，在各国人民仍然非得学习战争时，恶狼和羔羊仍然不能同居一室的世界里，它们分别象征着反复出现、常常必然互相对抗的战争与和平。书中谈到的既有并未诉诸刀剑的冷战敌对行为的事例，也有在总体战争和有限战争中动用刀剑的事件。书中提到了意大利、柏林和朝鲜的例子，在这些地方，战士们已经拿起犁和镰来医治战争的创伤。越南的例子则说明需要同时使用剑与犁，以剑来保卫犁耕种后的收获。在当前世界秩序下，战士和农夫必须团结合作，以维护他们两者都赖以取得安全和幸福的力量。

马克斯韦尔·D·泰勒

第一章 一个陆军少尉的培育

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是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和我的职业。父母是我无法选择的，但是在选择其他两者，我多少可以自诩为判断出色，虽然我始终承认运气是时时处处在起作用的。我出生在密苏里州基特斯维尔的一所小木头房子里。基特斯维尔是一个乡间市镇，当时居民只有数百人，现在差不多也只有这么多，但是它始终因为是查里顿县政府所在地而感到骄傲。市镇本身离火车站约两英里，到火车站有骡车可用。我在童年时代，每年夏天到外祖父家的农场，都坐这种车，在车上感到其乐无穷，比堪萨斯城里的有轨电车有趣得多。我出生后两年，我们家就搬到堪萨斯城去了。

我出世时，父亲是一个年轻律师。他在当地一位律师的法律事务所学习了一段时期后，刚刚取得律师资格。需要他供养的不仅有他新婚的妻子——一个邻近的农场主的女儿，还有一个寡居母亲，现在又加上我这个嗣子。1901年8月30日，《查里顿信使报》上在事过四天以后，登了一则消息：“基特斯维尔的一位好学的、年轻有为的律师约翰·E·M·泰勒当爸爸了。他的妻子在星期一早晨八点半给他生了一个十一磅半重的儿子。母子平安，同时这位父亲正非常体面地大办各种喜庆活动，因为这是泰勒先生夫妇的头生。”虽然婴儿的体重一定是报纸给夸大了，但这一报道基本属实。从此，父亲

开始沉着审慎地承担他的新义务。他做事向来都是沉着审慎的。可是他一直没有再为家里增添人口而体面地大办喜庆活动，直到二十四年以后我同“迪迪”·哈帕结婚时才又这样办了一次。巧得很，“迪迪”和我同一天即1901年8月26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诞生。

六岁时，母亲替我在堪萨斯城的利肯斯小学附属幼儿园报了名，我最初的正规学校教育开始了。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和祖母——她同我们住在一起——就常常读书给我听，教我认字，使我早早地就对书发生了兴趣，所以入学后，学习进步很快。非常幸运，我在学校里遇到了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进一步激发了我读书的兴趣。那个时期，堪萨斯城的公立学校教学质量很高，我在小学和中学时的许多老师一生都是我的良师益友。老师们鼓励我的学习进度要比正常的进度快一些，所以我十一岁就读完了小学，十五岁就在东北中学毕业。

在这一段时期里，父亲在纽—米勒—坎马克—温格法律事务所工作，靠着微薄的薪金勉强度日。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第一次发生危机是在1906年的夏天，爸爸和我相继得了伤寒，虽然病情并不严重，但需要长期吃药治疗，尽管一切护理工作都是由母亲做的，债还是积了不少，最后共欠了为我家看病的医生一百美元。对父亲来说，这笔数目是相当大的，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才慢慢还清。至今我还记得付清最后一笔帐时全家喜庆的情景。现在，当我只开几个小时的会就接到一张一百美元董事费的支票时，我常常想，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这一百元钱对爸爸来说意味着什么啊。

暑假是最愉快的，因为到时候我可以去看望外祖父米尔

顿·达文波特和外祖母玛丽·伊莱扎·达文波特，他们的农场在密苏里州的基特斯维尔和多尔顿之间。那时我认为外祖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每个学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盼望下一个暑假快来，到时就能同他在一起了。外祖父只有一只胳膊，他是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的老战士，在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跟随普赖斯将军和谢尔比将军打过四年仗。他的军阶升到骑兵部队的中士，最后却到了步兵部队，他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我的马死了”。对我来说，最美满的一天就是白天跟他到田间劳动，晚饭后听他那个“胜利”牌留声机，让他给我讲南北战争的故事。对这场战争，他并不赞美颂扬，或者加以粉饰，那确实是一场使军队和百姓都受尽煎熬的苦战，但当他讲起“小伙子们”作战的情景时，他的双眼还是闪闪发光。在我本人也成了老兵以后，我私下感受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我真实的历史总是讲得不够确切，而对我戏剧性的经历往往加以渲染。因此，现在我就怀疑外祖父的那些“小伙子们”是否真象他所讲的那么英勇。不过，在他讲到共同的艰难险阻如何使人们结成互相忠诚和信任的战友情谊的故事时，确实是引人入胜的。

我早期对有关军事的事物所感到的兴趣，是在幼年时代阅读历史书籍时就已经产生的，然而主要还是在这位南部邦联的老支持者身边形成的。当我问外祖父我怎样也能成为一个军人时，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了西点军校的事。外祖父心目中的英雄李和杰克逊都是在那里学成后参加墨西哥战争和内战的。以后，凡是有关西点军校的书刊，我都找来阅读。到一定的时候我就立志要进西点军校了。在读六年级时，我

在一张表格上就填写了将来参军、当一名陆军少将的决心。这不仅表明我的自信心相当强，同时也说明我早年就有幸知道自己将来想要干什么——这对每个青年来说都是极有好处的事情。

立志要进西点军校是一回事，但能否进去又是另一回事。确实，只有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的父母才同意让他们的独生子到“炮口上找功名”。尽管律师这一行业物质待遇菲薄，父亲仍然致力于法律事业，并且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事业。在中学时我喜欢辩论，这使我父亲对我抱有希望；他认为，这充分说明我在法律事业方面必将取得成功。法律确实使我动心，但同参军比起来，只不过是我的第二志愿。

美国在1917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年我从中学毕业，并且进了当地的初级院校——堪萨斯市立工业学院。我在中学里所得到的投考高等院校需要的学分，对于一个期望进西点军校的学生来说是极不相称的，这些学分包括读了四年的英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两年的希腊语，但是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学分只达到最低限度的要求。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现象，我在工业学院一年级时集中选修不少数学和物理，我所喜爱的语文课程只继续选修西班牙文，我希望十七岁时在堪萨斯城读完两年工业学院的课程后能够报考军校。

但是，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打乱了当时许多青年的计划。我的同期同学全都比我年纪大，他们开始纷纷参军，使我对自己没能入伍感到很光彩。所以，到了1918年，我再也不愿意做一个“安居家室的人”，于是就谎报多一岁，登记应征了。在那次战争期间，一个青年要得到伙伴的尊敬，就得穿上军装；

拿到了兵役证，是仅次于穿上军装的一件光彩事。

我这行动虽然没有使父亲不高兴，但也惊动了，他积极为我寻求进西点军校的名额。最后，他给我争取到机会，参加我们密苏里州第五区国会议员威廉·普·博兰掌握的推荐名额的竞争考试。这一年，博兰有一个既可进西点军校也可进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推荐名额，我十分幸运，赢得了被他推荐去考这两个学校的资格，下一关是要通过两个学校的入学考试。两校的考试科目基本相同，只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多考一门地理，西点军校则多考一门历史。

我在应试时，西点的考试通过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则没有考取，因为地理没有考好。我记得在考地理时，有一张需要说明世界上一些偏远地方的地理位置名单使我大伤脑筋。一个是马六甲海峡，我胡猜它在中东，后来通过亲自查阅，才查明它在东南亚。这一失败使我感到羞耻，我不禁在以后的年代里把自己的遭遇同名画家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在西点的遭遇相比。惠斯勒在内战开始时的一个短期内，曾在西点学习，在毕业前因化学考试不及格，而被除了名。据说，后来他谈起这件事时这样说：“如果硅是气体的话，我就会当上一位将军了。”所以，现在我对海军朋友们说，如果马六甲海峡在地中海的话，我可能就已经成为海军上将了，虽然他们显然不相信我会当海军上将。

1918年10月30日晚上，父亲带我到堪萨斯城联合火车站，送我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如果不算过去偶而到州界那边的堪萨斯州堪萨斯城去看望我的表兄弟，这是我第一次出密苏里州去旅行。父亲告诉我怎样乘坐普尔门式的卧铺火车；在

车上怎样才能找到餐车，到终点站时怎样给脚夫付小费。他告诉我怎样从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去韦考肯渡口，然后再去西岸火车站，这些地名在我听起来象马六甲海峡一样陌生。于是，我和父亲握别后，就离开家乡去参加陆军了。从此，我就只是在军中委派工作的间歇之间匆匆来家探望一下外，再也没回家长住过。

我到西点后，被编进了一个正规班级以外的班，教学进程不同于正常班级，11月初入学，到第二年6月毕业。华盛顿当局当时已决定把这所正规军校改成一所同候补军官培训班相差无几的学校，以便多培养几百名步兵中尉和少尉军官，去参加预期将要在1919年夏季发动的胜利攻势。这一决定依我看来是不明智的。不过，德皇和兴登堡将军在得悉赫德森河两岸正在形成的对德军的新威胁后，就于11月11日，也就是在我报名入校当学员九天之后，决定答应停战了。正如我们现在在同班校友聚会时常说的那样，这件事对哪一方都很幸运。过了一定时间以后，军校就先把学制改为三年，最后又恢复为传统的四年制。所以，我的同班同学和我就成了四年制的1922年班学员。

因为原先计划只让我们这批人在西点短期学习，所以刚一入学时没有发给我们作为西点学员标志的灰色制服，只发给士兵军装，只是在战斗帽子上加一条黄色宽带以示区别，于是就使我们班得到“黄鹂班”的名称。当时西点比我们高的班级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新学员在“畜牲营”^①的入伍训练是由

① “畜牲营”是西点军校内对新学员进行基本训练的营区。——译注